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20.04.010

· 新中国新闻史研究 ·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历程及其未来展望

邓绍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是中国新闻传播史整体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分为曲折前行、恢复开拓、反思创新、繁荣发展等四个阶段; 研究成绩不小, 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展望未来,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创新发展, 应立足于新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紧跟新时代, 加强思想理论指导, 增强宏观历史思维和责任感, 推进史料文献的系统整理工作, 全面系统、客观深入地研究新中国新闻传播史。

关键词: 新中国; 新闻传播史; 现状评述; 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20)04-0072-14

201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特意增加了“新中国”新辞条, 释义为“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①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认为: 新闻传播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 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因此,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内容是考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国新闻事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衍变规律。新中国成立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全国人民创造了新闻事业的辉煌成就, 新闻传播学研究硕果累累, 学科地位不断提升。但是, 相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整体研究而言,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却不容乐观, 与新中国新闻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相称, 且存在严重不足, 亟需高度重视, 加强研究, 创新发展。

一、历史回顾: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历史学家蒙文通引据孟子“观水有术, 必观其澜”之语, 认为“观史亦然, 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 波涛万里, 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 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 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 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③新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史极为重要的当代史

收稿日期: 2020-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19ZDA320)。

作者简介: 邓绍根, 男,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新闻传播史。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第1460页。

② 方汉奇《方汉奇文集》(增订版)下,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第757页。

③ 蒙文通《治学杂语》, 见蒙文通《蒙文通学记》(增补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年, 第1页。

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新闻传播史研究者的重视。笔者将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实际状况和新中国70多年来的重大历史转折点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把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发展历程分为曲折前行、恢复开拓、反思创新、繁荣发展等四个阶段。

(一)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曲折前行(1949-1978)

从1949年至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受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时断时续,在曲折中前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是月,《新中国记者手册》由智源书局出版。该手册的封面设计与同时期的书册相比颇有特色,背景图案是各种报道新中国成立的报纸版面,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出版的新闻记者工作指导手册。主体包含前言、理论、技术和附录四个部分。“附录”部分即有部分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文章,由此拉开了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工作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开展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在新闻学领域,聘请苏联专家在大学主讲《苏共报刊史》,苏联报刊因此影响了新中国报刊史研究和教学。1956年,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教师编写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送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审阅,成为新中国第一份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以该大纲草稿为代表的新阶段的特点是“重视新闻传媒的内容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内容。它不仅是中国新闻史教学的依据,而且是引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纲要,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①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初步确立。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深受《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所确立的“革命范式”影响。在“大跃进”运动中,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写了《一个县报的成长》一书,介绍了黑龙江省海伦日报“全面宣传,全面报道”“部门协作,全党办报”的办报经验。1959年,《四川农民日报在1958年》《飞跃的三年:惠阳报报史》《金山报三年》《大跃进中的闽南日报》《淮安日报在前进》《1959年报纸工作总结》等小册子相继出版,积极展示和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成果。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写了《省县报纸跃进经验调查》,总结《河南日报》《新华日报》《湖北日报》《山西日报》《河北日报》等各级党报在报道群众运动、树立典型时的经验,旨在对报刊的宣传报道形成全国性指导。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写的《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从报纸性质和任务、新闻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群众路线、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养等方面展开,旨在指导新闻工作。次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写《中国报刊工作文集》,全书汇总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1961年间党中央关于报刊发展的重要政策、决议、理论和经验,以及中央党报、新华社和地方党报有关新闻宣传的重要社论和文章。

新中国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也有所发展。如广播史方面,1956年,《一个农村有线广播站的成长》小册子介绍了我国最早建立的农村有线广播站——吉林省九台县九台有线广播站从1952年建台至1956年的发展历程。1960至1961年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了《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中国人民广播史资料》和《中国人民广播十年(送审稿)》,均涉及新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情况。新华社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受到重视。1957年,石少华发表《新华社的摄影报道工作》介绍了新华社新闻摄影部新中国成立后的成立和发展的业务情况;1959年,他又发表了《新华社新闻摄影部十年》一文,对新中国新闻摄影业务发展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历史梳理。1964年,新华社主编的《我们的经验》,汇集了新华社1949年以来有关业务方针和业务思想方面的文件,关于组织报道和指挥采访方面

^① 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第28页。

的经验总结, 以及一些记者谈采访和写作体会的文章。

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也有研究成果出现。1959年, 罗列《十年来的我国新闻教育》认为新中国十年来新闻教育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并介绍了新闻教育发展的成就。“目前我国已有六个高等学校建立了新闻学系(包括新近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系), 在校学生大约一千七百名左右, 在新闻红专学校受业余新闻教育的人数可能还要多于这个数字。十年来, 各个新闻教育单位为新闻战线输送的新闻干部估计将近二千名。”^①

“文革”期间, 学术研究受到破坏,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基本停止, 转以研究报刊为主, 初步确立的“革命范式”深深影响了下一阶段的新闻传播史研究。

(二)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恢复开拓(1978-1999)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深远的转折意义,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 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 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1979年不仅是新中国正式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改革开放正确道路的第一年, 而且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华诞。随着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新闻学研究队伍也逐渐壮大, 至1985年, 全国范围内创建了40余个新闻学会和50多个新闻研究机构, 其中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的, 不下150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层次、多梯队、多兵种、老中青相结合的新闻史研究者队伍。^②

逐渐恢复开展的还有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史料整理和工具书编撰。1979年,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创办《新闻研究资料》, 以新闻史料搜集和研究为主, 发表的部分文章涉及新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是年10月,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印了《红旗杂志索引(1958-1978)》。同年, 大众日报社编辑出版了《大众日报四十年(1939-1979)》。同年10月,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创办的许多报刊迎来了创刊30周年的纪念, 如湖南衡阳日报社编印出版《衡阳日报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专辑》。1980年5月,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印出版了《中国报刊广播文集》(1-6), 其中第5、6册收录的是1950-1964年新中国的报刊广播文集。1981年,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组织编印了《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1-3辑), 其中第二辑收录的是1949年10月到1953年底的150篇文件资料; 第三辑是1954年初到1956年底两年间的109篇文件资料。这两辑所选的材料比较系统、完整, 较好地反映了该期新华社的基本面貌。该所后来编印了《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四辑, 收录了1957年到1966年的文件资料。同年, 《中国青年报》迎来了创刊30周年纪念, 中国青年报社编印了《我们走过的路: 纪念中国青年报创刊三十周年》《青年报人的回忆: 纪念中国青年报创刊三十周年》。1982年, 新中国第一部大型资料性新闻工具书《中国新闻年鉴》正式出版, 该年鉴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负责编撰, 大规模地整理和收集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料由此开始。此外, 《北京日报三十年》《四川日报三十年》《光明日报三十年》等当代新闻史籍相继出版。

1983年,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史料整理工作得到了延续, 《体育报二十五年》《沈阳日报三十五年》《〈中国青年〉六十年纪念》等书籍先后出版发行。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整理出版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4年, 一批纪念性新闻史料书籍出版, 如《解放日报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念集》《湖北日报大事记》《黑龙江日报三十年》《甘肃日报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念册》《春风吹又生——羊城晚报创刊28周年复刊5周年纪念特刊》《锦州日报三十年》《纪念〈湖南日报〉创刊三十五周年专辑》等。1985年以后, 每年都有数本报刊创刊周年纪念性史籍出版, 地方新闻史志编撰也有成果出现。如《开封

① 罗列《十年来的我国新闻教育》, 《新闻战线》1959年第18期, 第20页。

② 方汉奇《方汉奇文集》(增订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第42页。

市新闻志》(1985)、《高邮县志·文化新闻志》(1986年初稿)、《张家口报纸志》(1986)。至90年代末,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域出版了新闻志书,市、县一级的新闻志书也不在少数。

新闻研究者解放思想,积极呼吁开展当代新闻史的研究,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逐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开始了当代新闻史的书写实践,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1981年12月,方汉奇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建议加强当代新闻史的研究。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也应该抓紧进行。过去总觉得1949年以来所涉及的都是现实问题,还不足以言史,现在不行了,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原来属于现实的那些问题,也需要进行历史的总结了。目前史学界还有这么一个考虑,就是把近代史的下限,从1919年延伸到1949年。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这30多年将要纳入现代史的范围,再不抓紧研究,以后就越来越被动了。”^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开始组织人员编撰《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对新中国1949年10月到1981年6月的新闻传播史实进行了编年史梳理,并于1983年正式出版。1986年,方汉奇撰文总结1978年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指出学界存在着“对当代新闻史的研究不够”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新闻事业史没有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总结,不能不说是新闻史研究工作中的一大缺陷。”^②同年,许多研究者纷纷呼吁加强当代新闻史研究。如钱辛波撰文呼吁“大家来写当代十年新闻史”,他认为,“文革”后十年“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值得大书特书。^③郭镇之则主张“研究当代新闻史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三十六年了,这期间新闻事业的进程与共和国的成长是大体同步的,应当及时进行历史的反思,得出公正的结论,引出适当的教训”。^④同年10月底,方汉奇在黄山召开《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编写工作会议,讨论编写提纲和指导思想,确定编写体例和对书稿的质量要求,开始当代新闻史书写的实践。

在当代人编写当代新闻史的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逐渐开展起来,并不断涌现出新成果。1985年2月,壮春雨编写出版《中国电视概述》。1987年,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当代中国丛书·新闻卷〉编写工作的通知》,成立编写指导小组,议定重要问题,审定重点书稿。“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成立,先后出版《中国的广播节目》《中国的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中国的电视台》《梅益谈广播电视》等书籍。有些书籍研究整理的时限就是1987年,如《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1947-1987》。1988年中央电视台出版《中国中央电视台30年:1958-1988》一书。同年,出现了中国第一篇关于中国电视史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⑤。同时,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⑥。

由于当代新闻史编修难度较大,系统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直到1992年才出现。是年6月,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张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正式发行,本书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年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及经验教训,记述和探讨了中国大陆的名记者在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活动和成功

^① 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体会和建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总第十一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2年,第156页。

^② 方汉奇《花枝春满,蝶舞蜂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新闻与传播研究》1986年第1期,第4-29页。

^③ 钱辛波《希望大家来写当代十年新闻史》,《新闻战线》1986年4期,第19页。

^④ 郭镇之《应该研究当代新闻史》,《新闻战线》1986年12期,第21页。

^⑤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年。

^⑥ 如1986年,中宣部王福如牵头主持申报的《新闻事业与现代化》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立项资助。1988年,方汉奇主持申报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也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资助,课题第三部分就是新中国新闻事业史。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积极推动下,《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编辑部成立,并组织学术力量,编撰《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一书。1990年,赵玉明主持申报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

之路,并介绍了台湾、香港新闻事业的变化与现状,是新中国新闻传播史领域的开拓之作。王福如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新闻事业的研究上。由于种种原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尚处于开创阶段”^①,阐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2月,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第一部教材——方汉奇、陈业劭主编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由新华出版社出版。1994年,童兵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专著《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出版。该书以“思”见长,记叙了新中国成立后42年间新中国新闻事业在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及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1997年,《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上、下)出版,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为新时期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详细的历史资料。

除了以上新中国新闻传播断代史外,通史性质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也有部分包括新中国新闻事业内容,如方汉奇和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2版)》(1995)、刘家林的《中国新闻通史》(1995)、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1998)、白润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纲要》(1998)等。

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不断拓展,在报刊个案史、广播电视史、新闻人物史、军队报刊史、地方新闻史、新闻业务史、海外华文新闻史、少数民族新闻史、新闻工具书、网络新媒体等领域都有一批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产出^②。同时,刚刚诞生的网络新媒体也受到学界关注。1996年,闵大洪发表论文《中国步入计算机网络时代》^③,记录了中国互联网和网络新媒体发展情况。之后胡泳、范海燕合著的《网络为王》(1997)、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1997)、严耕主编的《透视网络时代丛书》(1999)、姜奇平主编的《数字论坛丛书》(1999)等一系列著作相继出版,在短时间内迅速丰富了网络新媒体的研究。

1999年迎来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华诞,一些新闻传播史厚积薄发之作纷纷问世,新中国新闻传播史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是年1月,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出版,其中收录了大量的新中国新闻事业史料。2月,方汉奇、陈业劭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出版,时间跨度从1949年10月至1991年。同时,由方汉奇长期组织编撰并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中、下,公元713-1997年)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作为时间跨度最大,资料最翔实、最权威的中国新闻史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和多年一直在整理并最终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代表了我国当时新闻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④,其涉及的新中国新闻事业部分更是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权威成果。同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序言,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② 报刊个案史,如《四川日报四十年》(1992)、李庄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1993)、穆欣的《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94)、《黑龙江日报史》(1995)、《羊城晚报社史》(1997)等;广播电视史,如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1991)、《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1993)、《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1994)、《当代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大事记》(1997)、《中国广播电视报简史1953-1995年》(1997)、《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等;新闻人物史,如顾行和成美的《邓拓传》(1991)、萨云的《萨空了》(1996)、谭一的《毛泽东新闻活动》(1999)等;地方新闻史,如方积根编著《台湾新闻事业概观》(1990)、王澄《陕西省报刊简史》(1990)、钟紫主编《香港报业春秋》(1991)、梁群球主编《广州报业:1827-1990》(1992)、黄河编著《北京报刊史话》(1992)、陈承铮编著《河南新闻事业简史》(1994)、陈昌凤的《香港报业纵横》(1997)、刘燕南编著《台湾报业征战纵横》(1999)等;新闻业务史,如《新闻改革十年回顾与展望》(1992)、魏永征等人编写的《上海新闻改革15年》(1994)、曹鹏的《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1999)等;海外华文新闻史方面,如杨力著《海外华文报业研究》(1991)、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1998);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成果则有马树勋《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1990)、白润生《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1994)、《蒙古文报刊简史》(1999)等。新闻学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1991)、《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991)、《新闻学大辞典》(1993)、《中国新闻纪录大全》(1999)等。

③ 闵大洪《中国步入计算机网络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第22-29页。

④ 吴廷俊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8页。

成立50周年,展现中国新闻事业五十年的辉煌成就和新闻媒体的良好风貌,中国记协组织了“新中国新闻事业五十年”征文,并精选了新闻界著名人士的优秀论文50篇,于次年出版了《新闻事业的辉煌:新中国新闻事业五十年优秀论文集》。10月,中国记协举办了“中国新闻事业50年成就展览”,诸多新闻刊物刊登了纪念新中国新闻事业50年的文章,如《新闻事业五十年成就辉煌》《新中国新闻事业50年概述》《我国新闻事业50年的蓬勃发展》《探索的历程 多彩的事业——黑龙江省新闻事业发展50年》《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从无到有,发展迅速:陕西新闻事业50年发展概况》等。

(三)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反思创新(2000-2009)

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硕果累累,新闻史研究者锐意进取,自觉反思新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争论中追求学术创新。该阶段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也体现了这种反思创新的特点。新闻史研究者进行世纪反思,组织学术笔谈不断拓展研究路径、领域、方法,使得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了较为全面地提升。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整体进步也带动了当代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史学传统框架下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①。

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也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进行了学术反思。2000年,丁淦林撰文认为“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新闻史学科应该同其他学科一样,乃至同我国的各行各业一样,认真总结过去,积极开拓未来。特别是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新闻史应该大力加强学科建设,争取有更快、更大进步。”^②同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中外新闻传播史、传播全球化、网络传播、新闻传播业的自律与他律、新闻改革、媒介经济、‘入世’对新闻业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等10多个方面的论题”^③,会后还出版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文集。2001年,《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的六卷本陆续出版,展示了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勾画了它们未来发展的基本轮廓。尤其《新闻史学史卷》全面系统总结、评介了新闻史发展的分期,各时期新闻史的研究特点及其代表性著作,代表性的新闻史学者及其成就、贡献和影响,以及他们的局限、不足和阙失等。此后《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2002)、《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2005)、《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2005)等学术反思著作陆续出版。

2007年,新闻传播史学者不断反思和探讨新的新闻传播史研究路径^④。正是在学术自觉反思与思想交锋中,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迎来了一个研究新意迭出、精品频现、创新性学术成果累累的局面。在新闻史书写方式上寻求突破的是方汉奇和陈昌凤主编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2002),该书以较为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了当代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重要画面:理论发展与争论、业务改革进程、媒介产业化的突飞猛进、广播电视的地空对话、第四媒体、通讯社,在六个层面内部又交错纵横,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进行了一场“浸入式”的描画。新闻史学者力求摆脱革命范式的羁绊,积极探求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范式,并付之书写尝试,不断推出富有新意

^① 如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2000)、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2000、2004,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方汉奇主编《〈大公报〉百年史》(2004)、徐培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2006)、白润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2008)、张振亭的《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学术史研究》(2009)等。

^② 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133-140页。

^③ 高金萍《回首百年沧桑 研讨世纪课题——“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34-37页。

^④ 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第1期组织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刊发了丁淦林、吴文虎、李彬、黄瑚、黄旦等人的5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创新的体例、视野和方法。此后,又相继发表了张昆、宁树藩、吴廷俊、程曼丽等人一系列的文章等。《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专门组织了“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专栏;2009年第4期又组织了“海外学者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期话题”。

的代表作。如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2001、2009)是“新闻本体”范式的代表;李彬的《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15》(2007、2008、2009)是“新新闻史”范式的代表;吴廷俊的《中国新闻史新修》(2008)是媒介生态范式的代表;陈昌凤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2007、2009)、胡正荣和张磊主编的《时代之印:中国媒介三十年1978-2008》(2008)等为“媒介社会学”范式的代表。此外,也有通史类著作在结构编排上寻求突破。吴廷俊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09)一书突破以时间为轴的书写方式,转而按照新闻事业的组成要素作为划分依据,分为报刊史、广播电视史、通讯社史、新媒体史、新闻教育与学术史。许正林所著的《中国新闻史》也以横向视野,分别对中国古代传播、民族报业、期刊业、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教育、新闻制度和新闻思想等进行了系统描述,勾勒出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全貌。

这一阶段的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范围继续创新拓展,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同时一些研究引入其它学科的理论,提供了新闻传播史研究可以继续创新拓展的空间。如周德仓的《西藏新闻传播史》(2005),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西藏地方新闻事业历史的著述;林如鹏的《广东报业竞争三十年》(2008)结合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的理论,多角度全方位地剖析了广东报业发展、壮大的特点与经验;蔡铭泽主编的《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研究》(2006)系统论述了广东数个报业集团在新闻业务改革和报业经营管理上的创新。此外,地方史的研究成果还有马光仁的《上海当代新闻史》(2001)、王天滨的《台湾新闻传播史》(2002)和《台湾报业史》(2003)、陈鸣的《香港报业史稿》(2005)、李谷城的《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2005)等。

这一阶段填补国内学术空白、较有创新性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著作有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的专著”^①。同年，甘险峰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历史专著《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出版。此外，还有第一部网络媒体史专著——彭兰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2005)；倪延年所著的第一部中国新闻法制史专著五卷本《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2006)；赵永华所著的第一部全面研究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专著《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2006)；余明阳所著的第一部公共关系史专著《中国公共关系史》(2007)等。不仅如此，还涌现出一批新闻图史、新闻教育史、新闻思想史、新闻业务以及新闻改革、海外华文报刊史、新闻人物研究等著作，如《中国新闻图史》(2002)、《中国新闻教育史论》(2003)、《当代中国新闻改革》(2004)、《中国报刊图史》(2005)、《中国新闻学之最》(2005)、《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2006)、《中国新闻事业图史》(2006)、《新媒体论——CCTV.COM的第一个十年》(2007)、《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2007)、《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史》(2007)、《改革开放30周年与新华社纪念征文选》(2008)等。

2009年，新中国迎来了60周年华诞，相关新闻刊物上登载了20余篇纪念新中国60年新闻事业发展的文章，同时，新中国新闻传播史著作不断出版，如《新中国60年·学界回眸：新闻学发展卷》(2009)、《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史》(2009)等，各种新闻刊物刊发以“新中国60年”为题的新闻传播史论文达20余篇。

(四)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繁荣发展(2010年以来)

2010年至今，新闻学界纷纷响应和积极践行“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号召，一批以纪念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专著陆续出版。2010年，刘家林的《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是“以一人之力”用十年的时间编撰的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当代新闻传播通史，填补了当代新闻传播史的空白。同年，胡正荣和李煜主编的《社会透镜：新中

^① 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国媒介变迁六十年 1949-2009》出版,该书采用媒介发展的角度,梳理和阐释了新中国六十年来来的社会历史。2011年,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采用了“史记体”写法,各章按照概述、大事年表、发展轨迹、媒体个案、典型个人、经验教训等六个方面进行记述和论述。2014年,李春的《当代中国传媒史1978-2010》立足于中国传媒业的深刻变革,把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新媒体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探究1978年以来三十多年里中国传媒变迁的路径与逻辑。2015年,“新中国新闻史”丛书陆续出版,包括李彬的《新中国新闻论》、姚瑶的《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常江的《中国电视史1958-2008》、王辰瑶的《新中国新闻报道史暨代表作研究》、李彬的《新时代新闻论》等。2018年,张建星、唐绪军等人主编的《中国报业40年(1978-2018)》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为契机,梳理中国报业的历史成就及现实困境。同年,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出版。该书是目前最新的通史类编年史,与第一版相比,主要增补了1998年至2016年中国新闻事业领域的重要事项。哈艳秋主编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也于2018年出版。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①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成果。7月,黄升民主编的《中国广告四十年》丛书陆续出版,丛书包括《中国品牌四十年》《中国媒体经营四十年》《中国消费市场四十年》《中国广告公司四十年》四卷本,铺开讲述1979-2019年中国的广告社会史。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唐绪军和朱鸿军主编的《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出版,该书分为三编十六章,既有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主干部分的检视,也有对一些分支学科研究进展的评述,还有对新闻传播学组织机构发展状况的描述,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梳理、总结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学与传播学各领域发展历程、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和未来图景的著作。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范军主编的《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也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正式发行。该书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系统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来的伟大实践和成就。11月,陆绍阳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科学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12月,胡线勤、王灿发主编的《新中国党报70年》出版。该书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了新中国党报70年的发展轨迹。

该阶段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产出颇丰,除上所述外,其他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点展开。

第一,新中国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面向更加多元。除新闻通史、断代史类著作不断问世外,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领域,如新闻传播教育史、新闻传播学术史、新闻图史、新闻法制史、新闻思想史不断创新拓展,诞生了一批采用新理论、新方法、选题新颖、视角独特、富有新意的著作。

具体而言,新闻传播教育与学术史方面的研究,有肖东发等增订的《新闻学在北大》(2011)、邱沛篁的著作《四川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论》(2012)、《川渝新闻传播教育35年》(2015)、申凡主编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史稿》(2012)、杜友君主编的《三十而立:中国体育新闻教育30年》(2016)等。新闻传播学术史也深入开掘。申启武和安治民的《中国广播研究90年》(2010)一书从历史背景、基本概况、代表人物、成果及平台建设、主要特征等方面分析了1920年至2010年广播电视研究的发展状况。谢鼎新的《中国广播电视研究的演变》(2014)致力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广电研究,他认为以1978年为界,可以分成以新闻宣传为中心的工作式研究和以媒介传播为中心的学科式研究。2015年,李秀云的著作《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通过剖析新闻学术史研究的核心要素——新闻学理论的形态变迁,侧面展现出中国当代新闻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闻图史著作有《中国红色报刊图史》(2011)、《中国百年新闻经典漫画卷》(2013)、《中国报

^① 各个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纷纷举办庆祝新中国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山西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设立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栏,刊发了相当部分的有分量的文章。

纸创刊号图史(全8卷)》(2013)、《中国近现代漫画新闻史》(2018)、《中国新闻漫画发展史》(2018)、《浙江当代新闻报业图志》(2019)等,这些著作从报刊登载的图片和漫画入手,将视觉化图像作为研究主体,并与语言学、修辞学结合,推动报刊话语诠释体系的纵深发展。

倪延年继五卷本《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之后在新闻法制史研究上再次发力,于2013年又推出《中国新闻法制史》一书,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2015年主持编纂六卷本《中国新闻法制通史》,将新闻法制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新闻法制关系密切的新闻制度研究主要有潘祥辉的《媒介演化论:历史制度主义事业下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研究》以及魏峰的《中国报业制度变迁研究——改革开放30年中国报业体制变革的经济学分析》等。

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中,刘卓在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研究》(2017)详细阐述自马恩到习近平的新闻思想,梳理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此外,新闻思想的个案研究层出不穷,如刘石磊的《胡锦涛以人为本的新闻宣传观探析》(2012)、王茹珍的《邓小平报刊思想研究》(2017)等。

新闻业务史和媒体经营管理史主要有涂光晋的《时代之“声”:新时期中国新闻评论研究》(2011)、王志勇的《中国报刊发行体制研究》(2013)、冯春海的《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变迁》(2015)、刘勇的《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嬗变(1978-2008)》(2016)、郑宇丹的《新中国的民营报纸》(2019)等。

对外宣传史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2010年有两部著作,分别是陈日浓的《中国对外传播史略》、习少颖的《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2011年,刘笑盈和何兰主编的《国际传播史》出版。2013年,李舒东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传播史(1958-2012)》出版。

第二,新闻人物研究中广泛运用口述史方法。相关成果有《中国教育口述史(第2辑) 罗列教授等亲历新闻教育往事回忆》(2013)、《广东传媒风云人物访谈录》(2014)、《体媒人物: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口述史》(2015)、何扬鸣《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口述史》(2017)等。曹轲主持的“南方报业人物口述历史”项目已经出版《南北互交: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2016)、《薪火相传: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2018)、《报人报国:范以锦传》(2019)等三部著作。

除口述史外,人物研究中还有《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全10卷)》《中国名记者》等大型丛书。《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描绘近代以来新闻人物的整体面貌,展现人物饱满的形象。《中国名记者》丛书自2014年出版至2020年,已出齐20卷。该丛书主要对中国400名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报刊活动和代表作进行介绍,其中当代新闻优秀工作者占据大量篇幅。此外,当代新闻学人的研究也取得了发展,如刘泱育的《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2013)和《方汉奇传》(2016)等。

第三,反映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新年鉴纷纷出版。除以往出版发行的《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外,新增《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和《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5年,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创办《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借鉴编年体史书设置相关条目,回溯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百年历程的基础上,全面记录并真实反映了2014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取得的成果,深度呈现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全景,为开展新闻传播学基础性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编撰,展现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状况,2016年后每年均有出版。该年鉴“主要介绍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各级各类新闻院系的教学科研情况,新闻传播教育近百年来所涌现的教育家、新闻工作者等,各级院校新闻传播教育特色学科的建设,全国新闻传播教育专业招生情况以及学生发展情况,以此全面展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面貌”。^①

^① 陈强《记录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历史与现实的著作——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7期,第89-91页。

第四,地方新闻传播史研究著述颇丰。这一阶段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延续了之前的势头,数量众多,佳作频出。主要成果有王文科和张扣林的《浙江新闻史》(2010)、张梦新《杭州新闻史》(2011)、蔡罕和黄朝钦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2012)、王传寿《安徽新闻传播史》(2014)、马艺《天津新闻史》(2014)、曹立新《台湾报业史话》(2015)。白润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和于凤静的《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2017)主要聚焦于少数民族地方的新闻事业,既可看作是地方新闻史,也可算作为少数民族新闻史。2018年,复旦大学出版了《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该书前后历时26年,全国40多位学者参与撰写,覆盖了全国所有省市(包括台、港、澳)自1822年至2000年间近180年的新闻事业发生演变的全过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着力表现出同一时段内不同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是一项极具开创意义的学术工程,可谓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收获。同年12月,《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报业卷(1978-2010)》出版,全书150多万字,“记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0年33年间上海报业改革发展的历程”。^①2019年5月,《山东省志·报业志》出版发行。这部50万字的志书客观记录了1991年至2005年山东报业媒体的发展轨迹和辉煌成就。同年7月,黄瑚教授编撰的《香港〈文汇报〉简史(1938-2018)》出版。10月,《甘肃省志·报业志》(1898-2010)公开出版发行,“填补了甘肃省地方志报业专门志的空白”。^②

二、现状评述: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不足之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具备相当规模,涌现出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但目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新闻史研究者存在“赶场子,凑热闹”“追时髦,盲目西化”“重复劳动,走不出‘学术内卷化’怪圈”“自设禁区,不敢越雷池半步”等问题。有研究者热衷于“权威话题”,为各类政策作注脚,只做“注释史学”;有研究者忙于“热点话题”,为各种决策做理论论证,只做“服务史学”。^③具体到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上问题;由于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特殊性,还存在一些其他不足之处。

(一)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存在滞后性

从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关于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仍显不足。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大陆新闻传播史书籍共2233种,包括古代新闻传播史书籍25种,占1.12%;外国新闻传播史及中外新闻史均涉及的书籍153种,占6.85%;仅包括晚清民国(完全不含新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692种,占30.99%;包含新中国前后的新闻传播史书籍790种,占35.38%;仅含新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573种,占25.66%。从新闻传播史书籍分布比例可以反映出,目前新闻史学界的研究关注点更偏向晚清、民国时期,关于晚清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在研究范围、研究视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理论创新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拓展和进步;从研究成果数量上看,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多于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这显然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新闻事业的辉煌历程、伟大成就不符,与新中国70多年新闻事业快速发展相比,积累仍然不够深厚,研究存在滞后性。

(二)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整体性研究成果数量少,规模小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仅含新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573种,其中资料

^① 《〈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报业卷(1978-2010)〉出版发行》,《解放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9版。

^② 《〈甘肃省志·报业志(1898-2010)〉出版发行》,《甘肃日报》2019年10月21日第4版。

^③ 吴廷俊、李秀云《百尺竿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十年(2004-2014)述评》,《新闻春秋》2015年第1期,第8-9页。

汇编性质的书籍达376种;关于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细致,多以章、节、目等形式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教材或文献汇编中。在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书籍中,以新中国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新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历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不仅出现时间晚,而且数量少,规模也小,^①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上、下)》外,其他体量较小;像《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虽然是大团队研究,但研究的系统性还需加强,前者仅限于新闻传播学的70年学术史发展研究,后者则偏重于出版业的70年发展。目前新闻学界全面系统研究新中国70年来新闻事业史整体面貌的学术著作尚未出现。

(三)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受“革命史”范式影响较大

目前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受“革命史”范式影响较大。如1992年6月,张涛出版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其章节安排^②明显受到了“革命史”范式的影响。同年12月,方汉奇、陈业劭主编的教材《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③出版,其历史阶段的划分显然也以党史为标准。1999年,方汉奇、陈业劭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出版,也基本延续了“革命史”范式的党史标准。^④2010年,刘家林出版著作《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⑤体例有所突破,但还是没摆脱“革命史”范式的影响。

(四)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文献资料缺乏系统性整理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仅含新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573种中,文献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多达376种,占65.62%,而学术研究性质的为197种,占34.38%。其中,大多数书籍又是规模庞大的地方史志、各新闻机构出版的资料汇编或周年纪念性文集、新闻从业者的传记和回忆录等资料,实际学术价值不高。目前晚清民国新闻史得到了系统整理,而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料整理主要集中于中国共产党和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新闻工作文献。^⑥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料的系统性整

^①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13种;它们分别是:张涛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1992),方汉奇、陈业劭主编的教材《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1992),童兵著作《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1994),方汉奇、陈昌凤主编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2002),刘家林著作《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上、下)》(2010)、吴廷俊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2011),陈力丹《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史》(2014),李春著作《当代中国传媒史1978—2010》(2014),李彬著作《新中国新闻论》(2015)和《新时代新闻论》(2019),陆绍阳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十年》(2019),唐绪军、朱鸿军主编的《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2019),范军、李晓晔、王平主编的《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2019)。

^② 其章节安排为:第一章:中国人民新闻事业新纪元;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宣传;第三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第四章:六十年代前期的新闻改革;第五章: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新闻事业;第六章:新时期的新闻事业;第七章:台湾、香港、澳门的新闻事业。

^③ 全书章节安排分为五章:第一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闻事业(1949.10—1956);第二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事业(1957—1966.5);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1966.5—1976.10);第四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新闻事业(1976.10—1988);第五章:1949年以来的台湾、香港、澳门的新闻事业。

^④ 第三卷章节安排分为:第二十一章:新中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闻事业(1949年10月—1956年);第二十二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事业(1957年1月—1966年5月);第二十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1966年5月—1976年10月);第二十四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新闻事业(1976年10月—1991年);第二十五章:1949年以来的台湾、香港、澳门新闻事业。

^⑤ 上册分为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传播业(1949年—1957年4月);第二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事业(1957年5月—1966年4月);第三章:十年“文革”中的新闻传播业(1966年5月—1976年10月);下册分为:第一章:新时期80年代全面改革中的新闻传播业(1976年10月—1989年12月);第二章:新时期80年代新闻传播观念、内容及形式的大变革;第三章:新时期90年代深化改革中全面发展的新闻传播业(1990年1月—1999年12月);第四章:21世纪头十年稳健发展的新闻传播业(2000年1月—2009年12月)。

^⑥ 如1983年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014年增订)、1989年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党的宣传工作》、1990年的《新闻工作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选编1938—1989》、1996年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92》、1998年的《邓小平论新闻宣传》等。

理成果缺乏,即便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料已经整理收录至历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而在学术研究中也未得到充分的运用。

(五)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未能跟上新时代步伐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且诞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近十年中国的新闻事业日新月异,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发展迅猛,已经对社会系统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媒体融合成为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整体趋势。如此丰富的新闻传播实践值得从历史的角度对其发展过程和脉络做出系统总结。若以十年为一个小阶段,目前新闻学界则比较缺乏全面系统地研究近十年新闻事业发展的学术性成果。

三、未来展望: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创新发展

展望未来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着眼于新中国70余年来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全面系统研究新中国70余年来新闻事业(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对外传播、新闻传播教育和学术)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现新中国70余年来新闻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客观评价新中国70余年来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作用和社会贡献,深刻解读新中国70余年来新闻事业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发展逻辑,讲清楚新中国70余年来新闻事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道路、理论、制度和优势,阐释好新中国70余年来蕴涵的党和人民新闻舆论工作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基于以上认识,结合目前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足,未来研究的创新发展应从以下五方面寻求突破。

(一) 紧跟新时代,加强思想理论指导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诞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因此,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突破传统的研究视野,在继承毛泽东新闻思想、邓小平有关新闻宣传论述的基础上,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重要指导思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 增强宏观历史思维,突破“革命史”范式束缚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中国70余年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新时代,是在中华大地耸立的三座历史丰碑。^①回望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转折意义深远,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因此,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加强宏观历史思维,从长时段、整体、发展眼光出发,突破“革命史”的范式束缚,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作为发展脉络,充分把握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新闻

^① 当代中国研究所《新中国70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第1页。

事业的历史联系,处理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的历史关系;在此基础上,从新闻事业本体发展的角度,开展关于新中国新闻事业的系统性研究,其中既包括新闻事业的整体发展情况,也包括新闻事业的各类子项(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对外传播、教育和学术等)特定的发展轨迹,实现对新中国新闻事业全景式的立体考察。

(三) 推进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料的系统性整理工作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①这也是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遵循的史料整理原则。目前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料的系统性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同时,随着历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连续出版,必然推动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料的系统性整理工作持续有序发展。此外,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料的系统性整理工作应该有所规划,特别应该加强对新闻传播事件当事人、亲历者、见证人进行口述历史研究,保存好第一手历史资料。

(四) 史实描述梳理与经验规律归纳总结并重

史实的描述梳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此之上的经验规律归纳总结则是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②研究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归纳新中国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对外传播、新闻传播学术、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客观分析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与教训,才能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提供学术支撑和理论支持,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五) 增强历史责任感,全面系统、客观深入地研究新中国新闻传播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研究当代新闻史的意识逐渐加强,不断推进了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新闻界流行的“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名言,更加彰显出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当代价值和紧迫感,也意味着新闻传播史研究者更应该加强历史使命感,更加迫切地自觉进行当代新闻史研究。方汉奇鼓励当代新闻史研究者“当然,搞历史需要与现实保持一点时间距离,以便尽量做到‘冷处理’,但也不能拉得太远。现在抓紧搞还为时不晚,而且有很多有利的条件:第一,有了决议,30年来的是是非非基本清楚,从事这一时期的报刊史研究有所遵循,不致茫头无绪。第二,这30年来,大家都亲身经历过,情况熟悉,找人、找材料都比较方便,第一、二手材料也很完全、丰富,不会搞无米或少米之炊。”^③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历史责任感,首先要开展新中国新闻传播史填平补齐的工作,加强关于近十年新闻事业、特别是十年来发展迅速的网络与新媒体以及

^① 习近平《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第1版。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③ 方汉奇《方汉奇文集》(增订版)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对外传播的研究。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力求进行全面、系统、客观、深入。首先，研究内容力求“全面”，即对新中国新闻事业方方面面的诸要素进行全面研究，即“全覆盖”。空间上全覆盖，即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台港澳地区；媒介上全覆盖，即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与新媒体等；内容上全覆盖，即包括技术、业务、思想、制度、文化、教育、学术等。其次，研究力求“系统”，即借鉴媒介生态史观，对整体“新中国新闻传播史”展开宏观（作为“新闻事业”的新闻传播史，即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观（作为“新闻传播机构”的新闻传播史，即新中国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及其对外传播活动和机构，以及为新闻媒体服务的新闻传播教育和学术的发展历史）、微观（作为“新闻传播业务”的新闻传播史，即新中国新闻传播人物和团体、新闻传播技术、新闻传播思想观念、新闻传播法规与制度、新闻生产（事件和作品）、媒介经营管理等新闻事业诸要素）等三个层次的系统研究；再次，研究力求“客观”，即研究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坚持搜集第一手史料，尊重历史的实际存在，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新闻史负责的要求研究新闻史”，客观评价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作用和社会贡献，实事求是地看待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并对其经验教训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最后，研究力求“深入”，即全面系统梳理、研究（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对外传播、新闻传播教育和学术）等发展脉络的同时，深刻总结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衍变规律，及其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发展逻辑，探析其成就背后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优势，阐释好新中国蕴涵的党和人民新闻舆论工作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总而言之，展望未来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坚持大历史观，立足当下，胸怀天下，理论联系实际；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整理新闻史料，打好深井，做好个案研究，强化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本体意识；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放开眼界，沟通中外，增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创新发展，从而提升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整体研究水平，探索未来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罗诗婷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林春香）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vertic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authority , horizont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shared responsibility are the paths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sharing ,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allocation , and ac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xecution are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Logical Evolution and Path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Will Not be Corrupt”

HUANG Qing-bo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the anti-corruption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ierce , especially the strength has been deepening , the scope has been expanding , and the conditions and space for the growth of corruption have been constantly squeezed. By exploring the deep meaning of “will not be corrupt” at the macro , meso and micro levels , combing the logic evolution of “dare not be corrupt” “can not be corrupt” and “will not be corrupt” , this paper divides “will not be corrupt” into four levels “uneasy corruption” in mentality , “unnecessary corruption” in cognition , “unwilling corruption” in will ” and “ disdainful corruption ” in position. Based on this ,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our-dimensional path construction of all-round supervision , all-factor incentive , all-process control and all-coverage education.

Review and Prospect: The Researching Path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NG Shao-gen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i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Reviewing the researching path ,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y are the zigzagging time , the restoring time , the reflecting and innovating time and the prospering time. Although the achievements are fruitful , there are still numerous shortcoming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PRC should consistently basing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and making improvements in the following parts: keeping up with the new era and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strengthening macro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promoting the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ork;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comprehensively , systematically and objectively.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Xing-bo

Abstract: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s gone through many stages , such as tortuous exploration (1949-1976) ,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1977-1999) , deepening innovation (2000 to now) . It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overall scale continue to expand; education level continue to improve; teachers group keep growing , which have re-